



▲進入八十年代，大學的校園生活已變得多元化，就如圖中由英文系系會籌辦的英文辯論比賽，陳燕玲(左二)便是系會其中的一名委員。



四改三學制之爭

從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，轉變大學面貌最深遠的，要數「暫取生制度」和「四改三」。前者令中大收錄更多英文中學學生，後者則徹底改變教學的氣氛和性質。

吳奇燦說：「暫取生制度之前，每級同學的年紀可能相差甚大，因為部分同學可能從夜校苦讀上來，經半工讀才進入大學。曾經一位同學由於家境不好，要兼職幫補家計，聯合中文系的全班同學，竟為他分擔功課！」當日中大同窗之誼，可謂休戚與共。而暫取生實行後，中大的學生亦有年輕化的趨勢。

何安達說：「八十年代初，許多學生家境清貧，學生會甚至備有應急錢，供家境差的學生，上訴爭取政府補助期間暫用。」

蔡子強認為，暫收生的千秋功過，目前仍難下定論。中大既要成為亞洲頂尖大學，必須要爭取最頂尖的學生，暫收生制度無可厚非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因此而多收了英文中學的學生，又跟原來配合中文中學發展的理想偏離。

身為暫取生的陳燕玲則認為，暫收生對中學生較好，因為只需專心應付一次公開考試，然後在中六時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，減少學習壓力，也不必承受中七沉重的考試壓力。



令人懷緬的四年

大家對暫收生的意見也許有參差，可是對於四年制大學生活的眷戀，卻是沒有異議。

身為中學校長的吳奇燦說，回想當年四年制，與今日進入唸三年制的學生分別，在於是當年頗有「遊學」的感覺，在自我探索中成長。如今大學生功課壓力太大，只顧考試缺乏發展空間，

更遑論師生互動。大學太功能化，老師就不能跟學生探索生活。目前的大學生，入學到畢業，可能只認識中大數座建築物。當年有相當多學分，去選讀與本科無關的科目，學生可以任意選修，文科可報讀電腦科學，開拓視野。而成功報讀熱門科目，更加雀躍萬分。三年制後，選科自由已大為減少。

陳敬創也說當年選科比較自由，八六年正式取消學位試，只要足夠一百二十分便可畢業，故此選修可率性而為。不若三年制，每科都要當學位試般死讀。陳敬創說選修李天命的邏輯思考，中學時就沒有接觸機會，就令他大開眼界。

文振球說，當時他更完全想像不到，一位文科生竟然可以在醫學院上課，研究科學和人體奧妙。而理科出身的



▲這是1988年陳燕玲(第二排右四)參加新亞書院迎新營時攝。

的黃錦波，則是到大學選修了中文創作，才豁然開朗，發覺中文寫作，原來可以趣味盎然。

而當時中大所設大一中文和英文，亦令許多學生對語文茅塞頓開。吳奇燦說，任教大一英文的導師，通常是剛畢業的外籍大學生，師生之間打成一片，他開始讀New Yorker雜誌，也是受到大一英文導師的啟蒙。吳奇燦亦認為，中學教學注重過份技術化的學習，往往要到大學才能培養品味，懂得欣賞學問。

吳遠興亦認為，大學生活最具價值是學生活動，能改善人際關係。參予活動能學到人際相處之道，開會程序和領導才能。通識教育則令學生的視野拓闊，曉得利用不同專業角度，

去達成一件事，足證當日中大十年以來，捍衛四年制方向正確。三年制令學生的視野收窄，得不償失。

四年制的中大，亦令同學可得遇到不同學科的良好師。



▲當年逸夫書院院慶日，黃志明(右三)感受到濃厚的「新書院」氣氛。

吳奇燦特別提及中文系的小思(盧璋鑾、64新亞中文)，極受同學敬重，她請同學用深色的筆寫作，因為她鑽研現代文學，常看微縮膠片，以致眼力不好，審閱功課頗感吃力，但她孜孜不倦，無論同學是否主修中文，對每份功課仍然一絲不苟。

陳敬創亦特別提及哲學系的李天命(68新亞哲學)和社會學系的劉兆佳。八十年代，劉兆佳已經多次是港府的智囊，對香港事務分析鞭辟入裏。

何安達也補充說，當時在中大還有著名詩人余光中。而金耀基校長當年的「行政吸納理論」，亦傳誦一時，至今仍是分析香港殖民地官僚管治的重要理論基礎。黃宏發與學生上課，則受到學生餐廳煮酒論英雄，喝得醉醺醺之餘，爭辯得面紅耳熱，更是人所共知。

中大人說起當日上課的樂趣，大家幾乎是滔滔不絕，四年的大學生涯，可說是不亦樂乎。☞

